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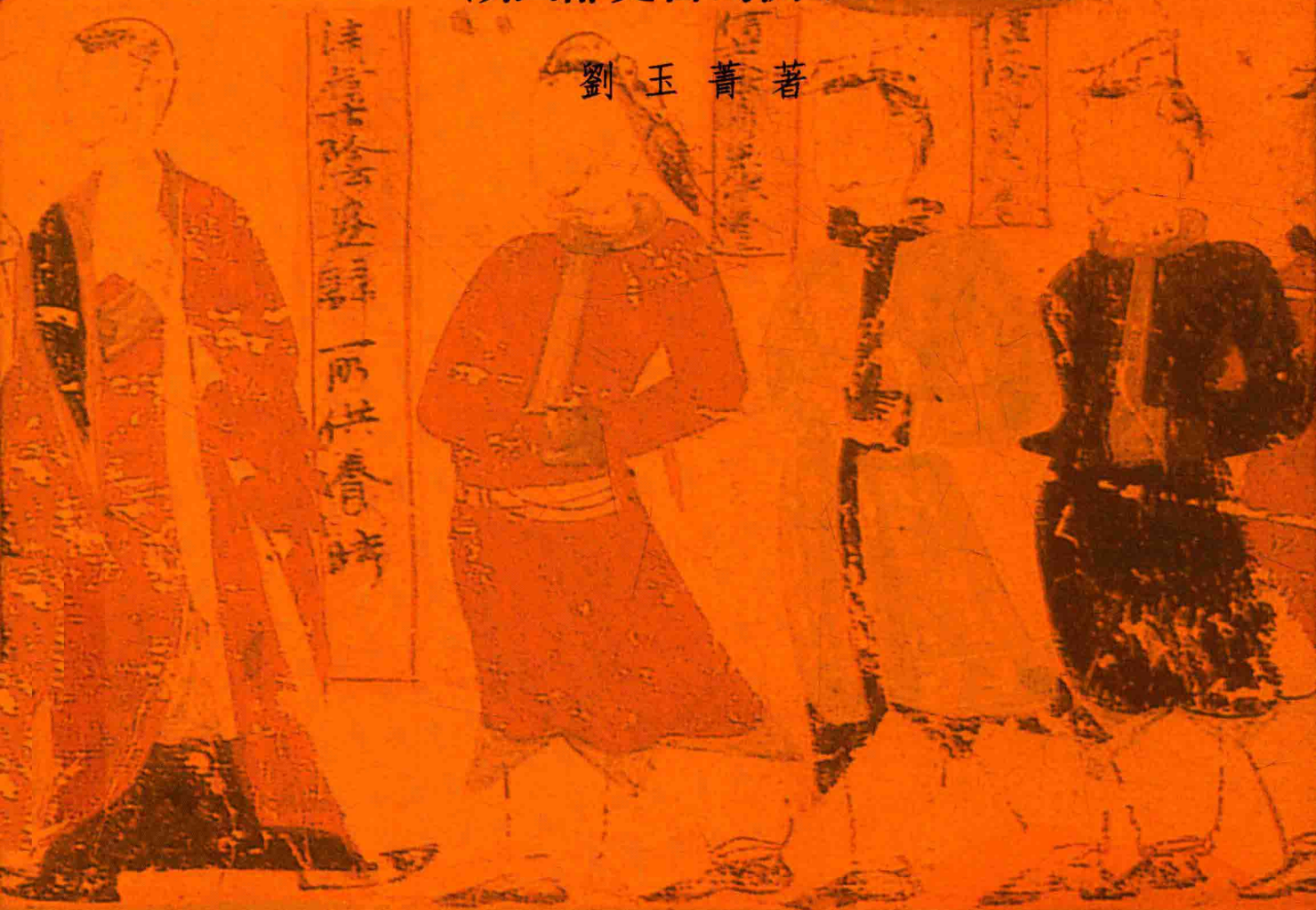
古代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第二一冊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上)

劉玉菁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五編

王明蓀主編

第21冊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上)

劉玉菁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以四部史書為例（上）

／劉玉菁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民 105〕

目 4+184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第 21 冊）

ISBN 978-986-404-618-8（精裝）

1. 南北朝史 2. 史學評論 3. 佛教

618

105002229

ISBN-978-986-404-618-8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五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404-618-8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上）

作 者 劉玉菁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49791 字

定 價 十五編 23 冊（精裝）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
——以四部史書為例（上）

劉玉菁 著

作者簡介

劉玉菁，臺灣高雄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宗教史、史學史。

提 要

史學與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皆有突出的發展與表現，兩者間是否存有內在聯繫，耐人尋味。目前學界在佛教對魏晉南北朝史學之影響的整體研究，已有若干成果；不過，就佛教對於南北朝史學，乃至針對南朝、北朝各自史學發展的影響比較，甚少關注，使得此一學術議題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

佛教勢張是南北朝時期顯著的時代特色，時代刺激學術，故探討南北朝史學的發展，不能忽略此時期佛教興盛的影響，「佛教——史學——影響」乃為本文核心主軸。需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本文論述的研究對象為廣義的佛教史學撰述，但非專門探討佛教史學；以及兩種文化在接觸、交流後，往往互為影響，然本文並非探求中國史學對佛教的作用，而是站在中國史學史的角度，著重區域空間這項變因，探究南北朝時期，「佛教」對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尤其重點聚焦於比較佛教在南朝、北朝發展之異，其是否、如何反映、呼應了史學在南朝、北朝發展之別。一般總將南北朝佛教採用一種總體、印象式的觀察，並沒有將南朝佛教、北朝佛教作為雙重視野來進行各自的考察，遑論將南、北佛教之異進一步應用於探討南、北史學之別。故筆者於本文先論述南朝、北朝佛教發展之不同，然後將此差異觀照南朝、北朝史學發展之差別，梳理佛教與史學兩者間內在脈絡、聯繫。繼而以「舉證」較析的研究方法，從正史和史注學兩種個案類型，分別舉《南齊書》、《魏書》兩部正史，以及《世說新語注》、《洛陽伽藍記》兩部史注著作為例，依南、北地域並置對照，進行具體的比較和分析。

本文主題為「佛教因素對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研究——以四部史書為例」，研究結果揭示佛教在南朝、北朝的發展同中有異，儘管此分歧是大原則、大方向的畫分，卻仍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可以用來概括觀照佛教在南、北地域空間上的差異，進而據以檢視、探究南、北史學發展不同。總言之，南北朝時期，佛教在南、北的差異，頗能一以貫之與南、北史學的差異相互參照，有所關聯，意即佛教與史學在南、北發展呈現的不同特色，大致互相呼應、吻合。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8
第三節 章節安排	26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29
第五節 研究貢獻與意義	32
第二章 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播	35
第一節 漢至南北朝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情形	35
一、方術到格義——漢至永嘉之亂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	35
二、永嘉之亂加速佛教的傳播擴張	38
三、南北朝時期佛教勢盛蔚為大國	42
第二節 佛教在南北朝發展的差異	55
一、信仰方式南北有異	55
二、如來皇帝與皇帝菩薩	61
(一) 北朝如來皇帝實行政教合一	62
(二) 南朝皇帝菩薩企圖政教結合	79

第三節 佛教的傳播媒介與受眾	94
一、佛教寺院與僧人	95
二、佛教觀念深入社會各階層	103
第三章 佛教的影響與南北朝史學的發展	115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概述	115
第二節 佛教對南北朝目錄學的影響	138
第三節 南北朝史注學的發展：佛教—經注—史注	148
一、史注仍受經注影響	148
二、佛教影響經注	152
三、經注、史注與佛教	157
第四節 佛教對中國舊有地理觀念的衝擊	164
第五節 與佛教相關的南北朝史著——以雜傳、 地理、目錄類史書考察	176

下 冊

第四章 佛教對南北朝正史的影響	
——以《南齊書》和《魏書》為例	185
第一節 蕭子顯《南齊書》所受佛教之影響	185
一、蕭子顯撰述《南齊書》的緣由	185
二、「服膺釋氏，深信冥緣」的蕭子顯	188
三、《南齊書》中的佛教思想	192
第二節 魏收《魏書》受到的佛教影響	199
一、《魏書》的成書背景	200
二、《魏書·釋老志》的撰著動機	203
三、佛教影響下的《魏書》	209
第三節 《南齊書》與《魏書》所受佛教影響之 比較	222
一、為佛教專立篇章	222
二、對佛理的闡揚與護教	225
三、佛教靈異事蹟入史	228
四、《南齊書》與《魏書》中佛僧、隱逸人物 之異	231

第五章 佛教對南北朝其他史書的影響 ——以《世說新語注》和《洛陽伽藍記》 為例	249
第一節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所受之佛教影響	250
一、劉孝標的生平事蹟	250
二、劉孝標注《世說新語》的動機	254
三、《世說新語注》中的佛教思想	257
第二節 「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的《洛陽伽 藍記》	282
一、《洛陽伽藍記》的撰著緣由	283
二、楊銜之與佛教	290
三、受佛教影響的《洛陽伽藍記》	295
第三節 《世說新語注》與《洛陽伽藍記》受佛教 影響之比較	319
一、對佛教的認識與護教	320
二、採合本子注的體例作注	324
三、記載靈異志怪之事	328
第六章 結 論	339
徵引文獻	347
圖表	
表 2-1 南北朝君主奉佛之事蹟	46
表 2-2 南北朝君主奉佛事蹟比較歸納表	54
表 3-1 紀傳體史書存目表	116
表 3-2 編年體史書存目表	117
表 3-3 雜史類史書存目表	118
表 3-4 霸史類史書存目表	119
表 3-5-1 雜傳類史書——分類傳記存目表	119
表 3-5-2 雜傳類史書——地區性傳記存目表	120
表 3-5-3 雜傳類史書——靈異志怪史書存目表	121
表 3-6 起居注、實錄存目表	122
表 3-7 譜系類史書存目表	123
表 3-8 地理類史書存目表	124
表 3-9 典志類史書存目表	126
表 3-10 目錄類史書存目表	129

表 3-11	史注類史書存目表	131
表 3-12	史評類史書存目表	132
表 3-13	南北朝史書數量分析表	133
表 3-14	南北朝史書類別排序表	135
表 3-15	隋代以前中國歷代佛經目錄列表	141
表 3-16	南北朝史注類史書書名有「音、音義、訓」者	158
表 3-17	隋代以前中國正史記載之「外國」相關篇目表	168
表 3-18	南北朝史書中為僧人史家撰寫者	176
表 3-19	南北朝僧人史家所撰寫和佛教相關之雜傳、地理、目錄類史書比較	181
表 3-20	南北朝俗人史家所撰寫和佛教相關之雜傳、地理、目錄類史書比較	182
表 3-21	雜傳、地理、目錄類史書在南北朝及其為南北朝僧人撰寫者之比較	184
表 4-1	《南齊書》和《魏書》記載佛僧一覽表	232
表 4-2	《南齊書》和《魏書》所載僧人事蹟分類表	243
表 4-3	《南齊書》和《魏書》隱逸人物傳中和佛教相關的事蹟表	244
表 4-4	隋代以前中國正史中的書、志	248
表 5-1	《世說新語注》中與佛教相關的注文類別	259
表 5-2	《世說新語注》所引與佛教相關的文獻史料	260
表 5-3	《世說新語注》中與佛教相關的注文	274
表 5-4	魏收、楊銜之仕宦經歷表	286
表 5-5	《洛陽伽藍記》中靈異志怪類別	298
表 5-6	《洛陽伽藍記》中靈異志怪記載	311
表 5-7	《洛陽伽藍記》中述及佛經、佛義、宣揚佛法的記載	322
表 5-8	《世說新語注》徵引之志怪小說	331
圖 3-1	南北二朝史書數量比例圖	134
圖 3-2	南北朝史書中僧人與非僧人撰寫比例圖	178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西晉的短暫統一外，南、北長期分裂。由於南、北方在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的情況不同，發展各異，因而在學術文化、宗教信仰諸領域均有不少相異之處，反映在史學上，南、北亦有不同。周一良在〈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中指出，從北朝史學著作看不到敏銳深刻的高見卓識，給人以識暗之感，較之南朝史學大為遜色。^{〔註1〕}名家卓見，燦然可觀，引發筆者一探究竟的研究興趣。周一良之立論乃以南、北學術風氣之別來觀照史學之異。《世說新語·文學》載：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劉孝標注：「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暗，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核，易核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註2〕}

又《隋書·儒林傳序》曰：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跡代陽，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

〔註1〕 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第二版），頁369。

〔註2〕 〔南朝宋〕劉義慶編，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1996年8月第三次印刷）上卷〈文學〉，頁216。

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註3〕

永嘉之亂後，南北分裂，北方持續受到兩漢以來章句訓詁之學的影響，治學偏於掌握瑣細的具體知識，涉及面廣，故謂「淵綜廣博，窮其枝葉」。南方則在魏晉玄學和佛教思想的影響下，偏重於分析思辨，追尋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謂「清通簡要，得其英華」。周一良從上述兩段闡明南北學術傾向異同之史料，以《論語》之言概括，認為北方偏於學而不思，南方偏於思而不學，然後據以推論南北史學的異同。主張南朝史學如牖中窺日，對歷史發展具有洞察能力；北朝史學如顯處視月，廣而難周，思辨性不強，缺乏敏銳深刻的高見卓識。〔註4〕此外，周一良主張在一個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領域內，還可能潛在一種共同的素質，貫串於各方面，名之為深義文化。〔註5〕繼而指出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學、文學以至宗教等領域內實存有共同相通之點，可以證成他的深義文化之說。周一良的看法慧眼獨具，給予筆者相當程度的啟發，刺激筆者對南北朝史學發展同異分殊的論題，產生窮原竟委的動機。

首先，周一良雖揭櫫南北朝史學受學術傾向影響而有不同，惜在追根究柢其所以然時，似嫌仍然侷限於玄學和佛教的影響，既疏忽佛教亦在北朝盛行，也忽略其他的變因。承此，筆者認為欲深入探究南北朝史學發展之異同，尚可從地域之別的角度切入從事研究。孔定方於〈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一文中指出，南北朝時期，儒學獨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壞，文化發展呈多元趨勢；在劃江而治的南北對峙的政治環境下，南、北文化出現歷史性的地域分流。南北朝之佛教因南、北各自旨趣相殊而有「南統」與「北統」之分，及「南義」、「北禪」之別。就整體風格而言，南統佛學偏尚義理，極富名理性格，講經說法風行，以玄思拔俗為高；北統佛學崇尚實行，富於踐履品格，禪風鼎盛，以修習禪定為勝場。在佛教典籍方面，南方偏於大乘空學，流行受大乘部影響之論典；而北方傾向實利，小乘一切有部之佛經大有市場。在禪法上，南方看重思維形式之探討，頓漸之爭聚訟紛紜；北方則盛行「像教」，坐禪篤信而少去涉足頓漸之訟。釋家在南朝士人中為學問，談論

〔註3〕〔唐〕魏徵等撰，《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七十五〈儒林列傳·序〉，頁1706。

〔註4〕參見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頁365～369。

〔註5〕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頁370。

相高；在北朝士人中屬宗教，重在戒行。〔註6〕周一良在闡述「深義文化」的觀點時，亦主張就佛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實踐，南方重思索辨析，這兩種不同傾向，與學術和文藝分野內的異同，似乎也並不相悖。〔註7〕依筆者管見，不同文化領域內的共同素質（即深義文化）實則各文化領域互相作用、彼此交流影響所致。以是之故，竊意佛教勢張是南北朝時期的時代特徵，不論南、北，佛教皆相當盛行，故將外來的佛教作為瞭解南北朝史學發展的觀察點，尤其從佛教的地域分野來更深一層探究，不失為一條可行之徑，是值得開闢研究的視域。

再者，周一良分析南、北經學影響各自史學發展的事實，主要是舉南朝范曄（398～445年）的《後漢書》、沈約（441～513年）的《宋書》和北朝魏收（507～572年）的《魏書》中的序和論相比較。筆者認為，研究的對象可再擴大。馬豔輝在〈制度、興亡、人物評價：南朝北朝史論異同辨析〉一文中，除了正史，另舉裴子野、何之元、陸機、袁宏、李公緒等史家著述為例，加以比較。文末，馬豔輝歸納其結論曰：「南北朝史家處於不同的歷史環境，直接影響他們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評論有所不同，進而反映他們的史觀不同，以致造成南、北史論的差異。這種差異在不同的問題上尤顯長短互見。但總的來說，北朝史論來得平實，較少門閥氣息，南朝史論往往比較深刻，然門閥氣息過重。」〔註8〕馬豔輝擴舉其他史書為研究對象，並從史論的度角

〔註6〕孔定芳在〈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一文中探討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存有地域上的南北之異，並分析箇中原因，包括地理上天然的分界，以及此時南北政權的對峙隔絕，相對減弱了文化在南北地域間的滲透力。北方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使北方文化置於一種迥異於南方的特殊政治氛圍中，促成北方漢族士人治學多重政治，且注重力行與踐履，南方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是漢族文化，漢人悟性早啓，文化昌盛，士大夫文化素質足以使其開展學術性的文化研究，故思辨見長；永嘉之亂後，儒、玄兩種學術流行的地域性和層次性不同，北方是儒學昌隆的文化氛圍，深刻影響其文化的風貌特徵，由於儒學的社會實踐性強，重實務入世，是故北方宗教文化重樸崇實，尚政治、重踐履而不務空言。孔定芳提出許多解釋南北宗教文化相異之因，筆者認為這些原因同樣運用於解釋南北朝史學之異當為可行。參見孔定方，〈南北朝宗教文化之地域分野〉，《中州學刊》1998年第1期，頁127～132。

〔註7〕周一良，〈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頁370。

〔註8〕馬豔輝比較：（一）關於分封制與郡縣制之論的異同。（二）關於皇朝興亡的不同認識路徑。（三）關於正史類傳史論的異趣，從此三方面希望尋求對南北朝時期的史學，特別是史論的發展，南、北方有何差異，能有更全面的認識。參見馬豔輝，〈制度、興亡、人物評價：南朝北朝史論異同辨析〉，《江海學刊》2008年第2期，頁163～168。

切入，探析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適對周一良的研究進行拾遺補缺的作用。

此外，胡寶國在〈南北史學異同〉一文踵繼周一良的論述，指出除了史論外，北方史學在很多方面都呈現出與南方史學不同的特點，包括第一，北方史學較為關注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問題，而南方則否；第二，相對於南方，北方多官修史書，私人撰述較少；第三，從淵源上看，與繼承魏晉的南方史學不同，北方史學比較強調繼承漢代傳統。胡寶國之論眼光獨到，頗有心得，對南北史學異同之處進行了精闢的概括，提供筆者饒具學術價值的視野。然胡寶國所界定的「南北」史學異同，涉及的是一個較長的時段，乃自東晉十六國至唐初，而非僅指南北朝時期。其次，胡寶國於文末歸結道：「東晉十六國以後，包括史學在內的南北學術的不同其實是導源於魏晉時期中原與河北學術的不同」，〔註9〕此乃立足於以文化區域的觀點，宏觀的檢視南北學術。雖然這樣的研究視角深富意義，不過，以魏晉南北朝時期活躍的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而言，胡寶國的論述過於將中國視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忽略了外來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尤其佛教的傳播，在南北朝是一不容忽視的歷史課題，隨著佛教流傳愈廣，中國自身學術文化自然與佛教互動加深，對彼此皆會造成相當的作用。

以上三位學者的立論主要以政治為主軸的傳統史學著作進行比較，不免遺憾。中國史學領域浩繁，史籍汗牛充棟，若欲確切深入瞭解、比較南北朝史學之發展，竊意與歷史相關的佛教典籍和文人著作，亦具研究價值。陳垣言：「中國佛教史籍，恆與列朝史事有關。」〔註10〕指出佛教史學〔註11〕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佛教史籍中所記載有關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諸方面的內容，是值得重視的史料，可以補充傳統史書所載之不足。魏晉南北朝時期，

〔註9〕 胡寶國，〈南北史學異同〉，收入氏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86～213。

〔註10〕 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緣起〉，收入氏著，《中國佛教史籍概論》（臺北：新文豐，1983年），頁1。

〔註11〕 嚴耀中將佛教史學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佛教史學是專門關於佛教歷史的，一般指佛教史家的專著，諸如《高僧傳》，或專門論述佛教的有關史著，如《洛陽伽藍記》。廣義的內容則包括所有有關佛教歷史的記載和議論，如正史中的《魏書·釋老志》、《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及《晉書·藝術傳》裡佛圖澄、鳩摩羅什、僧涉、曇霍等一些僧侶的傳記等等，都是關於佛教的重要史載。此外，廣義的佛教史學還應該包含史料學。見嚴耀中，〈試論佛教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3期，頁134。本文擇採廣義佛教史學的角度來探討佛教與南北朝史學的關聯性。

佛教在中國的勢力急速擴大成長，佛教史學於此時期已蔚為大觀。僅據《隋書·經籍志》的史部所載，僧人史家與世俗史家所撰之與佛教相關著作，便相當粲然可觀。〔註12〕錢穆曾指出時代與學術互相發生作用，為什麼這時代會產生這許多書，此是時代影響了學術，但這些書對這時代又發生了什麼影響，這是學術影響了時代。〔註13〕所言甚是。魏晉南北朝是一富於宗教熱情的時代，佛教在此時傳佈深廣，蔚為大國，是則這樣的時代氛圍必然牽動學術的發展，是以產生了為數眾多的佛教史學著作；反之，佛教史學的成果亦會對該時代有所回饋，造成影響。歷史包含著過去一切，關於佛教在中國二千餘年傳播的歷史，和中國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息息相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因此，佛教史學自當與中國的所有領域（包括史學）相通，交互作用。承上所述，當我們在探究南朝、北朝二者間史學異同時，此一時期的佛教發展乃是不可忽視的變因，並且佛教史學的相關著作應當列入研究的對象，方可成為完整的考察視域。

綜上所述，文化中各領域（史學、文學、經學、藝術乃至宗教……等）必然會互相影響，同時表現「授」與「受」的雙重身份；並且文化中各領域的發展也會受到外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影響（當然這些外在因素同樣會受到文化的影響）。以是之故，探討南北朝史學的發展，內因、外因實為交光互影，環環相扣，皆需被檢視和探究。尤其值得再加以探究者，誠如嚴耕望所論，治中國史者往往僅依時間此一軸線，論述各時代核心區域的發展，所謂「通古今之變」，然卻往往忽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度內區域間的差異性，以及此一問題對於全史所發生的影響。嚴氏更認為，要真正瞭解中國歷史的整體，唯有同時掌握核心地區時間性的一線發展，與廣大空間全面性的發展，方能稱之為「整體的中國歷史觀」〔註14〕是以對於南北朝時期，地域上宗教異同現象的重視與探求，無疑能對時間——人類歷史，所交織而

〔註12〕例如釋曇璿所撰《僧家書儀》，釋寶唱撰《名僧傳》與《尼傳》、釋慧皎《高僧傳》、釋法進《江東名德》、釋僧佑所撰《薩婆多部傳》和《世界記》各五卷，釋法顯《佛國記》、釋智猛《遊行外國傳》、釋道安《四海百川水源記》、釋曇宗《京師寺塔記》、釋曇景《外國傳》、釋慧生《慧生行傳》、釋法盛《歷國傳》……等。世俗史家所撰的佛教史著作，則如裴子野《眾僧傳》、康弘《道人善道開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張光祿《華山精舍記》、劉瑒《京師寺塔記》……等，不勝枚舉。

〔註13〕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重印二版三刷），頁112。

〔註14〕參見嚴耕望，〈歷史地理與歷史研究〉，收入氏著，《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1991年），頁597～598。

成的歷史思維，再注入空間的思考觀點，進而架構成時間——空間——人類歷史三者皆具，更為立體、全面、完整的歷史敘述。〔註15〕

大體言之，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影響漸深且廣，此固不待言；但審實論之，亦逐漸呈現南、北佛教分途發展下的不同性格，塚本善隆對此提出看法言：

北方佛教，不論是神仙道術式佛教，或是承認君主專制、依附國家權力弘法布教的道安和鳩摩羅什的佛教，都比江南方外的、貴族的、獨善的佛教更富現實性和社會性，具有廣濟眾生的實踐宗教的熱情。現存南北朝佛教徒的著作，大半出於南朝，南朝有關佛教教義的研究及佛教禮儀的創製都很興盛，但卻未曾出現過有號召力的、實踐的宗教運動。〔註16〕

許理和持相似見解，且富有細部地域色彩的考察，其論述曰：

西元四世紀下半葉，在晉帝國中部和東部形成兩個勢力範圍。帝國首都、東部及東南部（即江蘇南部和浙江）處於中央管轄之下，而中部州縣主要是江州和荊州（大約相當於今江西和湖北），則大部分

〔註15〕曹道衡論述南北朝學風的差異時，是從地域的不同來著眼分析。總的來說，南北朝時代南、北兩地學風差別是很大的。《隋書·儒林傳》所說：「南人約簡，北學深蕪」的情況，其實並非形成於西晉滅亡後，南北兩個政權出現之時，而應該追溯到東漢後期。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本以今山東～河南二省黃河以南地區最為發達，這裡士人對東漢後期腐敗統治感受最深。由於這裡是士人集中之地，交遊論學之風極盛，推動了新學風的形成。西晉滅亡後，這裡的士人逃往江南，和江南士人共同創造了南方的學術。至於黃河以北地區，由於戰亂，人們長期聚居塢壁之中，獨學無友，所見不廣，學術上較滯後。北朝人的論學，往往限於學術問題，和文藝創作並無關聯，南人論學，有時還兼作論，思考性較強。參見曹道衡，〈略論南北朝學風的異同及其原因〉，《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總第四十四卷第4期，頁78～83。又周積明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分為南北兩大區域，認為在經學、文學、佛學、民風以及書法、繪畫藝術等領域，南、北地區有著明顯的差異，南方注重情性抒發，長於思辯，風格婉麗柔美；北方重樸崇實，注重力行，風格謹嚴莊重，充溢著一種剛陽之氣。造成這種風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環境影響的因素。周積明，〈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南北文化〉，《社會科學輯刊》1988年第6期。曹道衡和周積明採地域角度考察南朝、北朝學術文化發展的分歧，啟發筆者更著眼、強調以地域的角度來研究史學史。

〔註16〕參見塚本善隆，〈魏晉佛教的展開〉，收入許洋主等譯，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思想宗教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235～247。

由半獨立的地方要員和軍事獨裁者所控制。……在都城和東部，產生了與王室、大城市權貴和都城中的政治生活緊密相連的新佛教。但同時，其他很重要的教團也在地方士大夫的支持下於中部地區形成。這些團體只是間接的與王室有關。理論上說，他們更獨立性和創造性，同時也更為明顯的受到北方的影響。……這些中心的僧人領袖（襄陽道安、廬山慧遠）和他們的許多弟子均來自北方。他們的理論觀點試圖結合南北佛教。北方佛教強調虔心修行禪定和法術，直接延續舊譯時代的經典；南方佛教相對理性化，是玄學和大乘觀念的特殊結合物，以《般若經》、《維摩詰經》為基礎而深於本體論的思辯。〔註17〕

許理和的論述精闢地歸納佛教在東晉時期已呈現地域之別的發展態勢，北方佛教強調虔心修行，南方佛教相對理性化，這樣大致的畫分基本上仍為南北朝所延襲。許理和的研究可謂落實了嚴耕望所重視之同一時間，同一國度內，區域間的差異性，此提供筆者進行區域性研究思考的基礎構思。〔註18〕

綜上所論，筆者肯定周一良提出的「深義文化」論點，以及認同嚴耕望強調研究歷史需兼顧區域空間的影響，故筆者認為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學、文學以至宗教等領域內存在著共同相通之點，能窺一斑而知全豹；並且佛教在中國傳佈所呈現的南、北地域分野，應與南朝、北朝史學發展有所呼應，存有隱性的內在關聯與結構，殊值探本究原，因此，本文擬以「佛教——史學——影響」的思考脈絡作為研究方向。

要特別指出的是，佛教史學和中國傳統史學，兩者在對象上和功能上有

〔註17〕〔荷〕Erik Zürcher（許理和）著，李四龍、裴勇等譯，《佛教征服中國》（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頁181～183。

〔註18〕有關江南重義解，北國重禪行之相對差異，嚴耕望從《高僧傳》和《續高僧傳》中所載錄的僧人事蹟，以義解與習禪的類別，統計分析其地理分佈，認為江南彭、壽重義解，太行山西重禪行，山東、河北兩者並行，而義解為盛，荊、益情形亦略如之。若更進一步作深入觀察，則可謂都市盛義解，而山林盛禪行，固不論方域之南北。詳參嚴耕望著，李啓文整理，《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稿》（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5年）第六章〈佛教教風之地理分佈——義解與禪誦〉，頁195～221。筆者認為嚴氏的研究貴在從都市（城）、山林（鄉）之殊，以另一種地域的視角來考察佛教於城鄉發展之不同，然由於嚴氏分析的史料主要是《高僧傳》和《續高僧傳》，兩書中的僧人能載入史冊，當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並無法代表當時南、北整體的教風。意即若僅從兩僧傳作為研究對象，則難免忽略社會全部階層，總體宗教風氣，以致涵蓋性有所不足。

著密切的聯繫，然而佛教史學最終納入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體系。據此，本文論述的研究對象涉及到廣義的佛教史學撰述，但本文並非專門探討佛教史學，而是站在中國史學史的角度，探究南北朝時期，「佛教」對中國「史學」所造成的「影響」，研究主體仍為中國史學，而其中特別將重點聚焦於比較佛教在南朝、北朝發展之異，其是否、如何反映、呼應了史學在南朝、北朝發展之別，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所在。目前學界在佛教對南北朝史學之影響的整體研究，已有成果，但反觀佛教對於南朝、北朝各自史學發展的影響比較，似乎是缺之弗如，甚少勾勒。故本文擇以「佛教對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影響」為題，首先關注佛教在中國傳播的情形，考察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媒介與影響，並分析南、北方的佛教差異。其次，先合而觀之，整體性探討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狀況、特色，掌握總體趨勢；再分而觀之，從中歸納南朝、北朝的史學發展有何異同？造成異同的原因是否與佛教有所關聯？繼而各舉南朝、北朝的史家和著作為例，進行比較、探討，深入分析佛教對南北朝史學的影響。藉由將南朝、北朝彼此間的史學異同，並置、對照，則各自的特殊性將會更加顯著、清晰。

最後，為史需明時間斷限，撰寫時方不致失焦脫軌。本文乃以南北朝作為研究的時間斷限，起自劉裕篡東晉建宋（西元 420 年）至隋文帝南下滅陳，統一中國（西元 589 年）。東晉之後，南、北持續分裂，南方有宋、齊、梁、陳，稱為南朝；北方有北魏，嗣後分為東、西二魏，各禪位於北齊、北周，此五個政權合稱北朝。永嘉之亂後，中國南、北長期對峙，在政治、社會、學術文化等方面，逐漸形成各自的特色，佛教亦因地制宜而有不同的發展。探討佛教在南朝、北朝發展的地域差異性，是否、如何影響史學發展亦呈現地域差異性，此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魏晉南北朝佛教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研究在學界向來受人重視，湯用彤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其中綽綽大者，為研究此時期佛教史必讀的經典之作。該書初版於 1930 年代末，湯氏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嚴謹周密的考證，梳理了佛教從漢代傳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以及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的衝突